

# 文物：历史教学中的重要资源

华文出版社

# 前 言

露脸与现眼，只有一步之遥。写书尤其如此。

我内心中的焦虑与职业上的压力合二为一，给了我敢于提笔写这本书的动力。

20多年前，我有幸被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朱筱新教授延聘任教，知遇之恩，终身萦怀。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开设由赵恒烈先生开创的历史教育研究领域课程，此领域在历史教学界有着一定影响；系主任朱教授天资既好，治学勤苦，又兼家学绵长，在中国古代史的治学上，颇为用力。他早年插队西北，在艰苦生活中仍治学不辍，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宁夏大学、北京教育学院任教。他专攻中国古代史，尤其致力于文物教学研究，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文物与历史》等专著，影响很大。他的教学深受学员的喜爱。自我进入历史系，朱老师一直对我谆谆教导，要求我把中学历史教材“滚”三到五遍，并要求我长期深入一线教学实践，思考文物与历史教学的关系及文物的教学运用。

2015年，我们计划以历史教材为线索，争取使每一节课都有一个典型文物可供展示，使文物成为教学中的重要支撑材料，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孰料工作开展不久，2016年1月，噩耗惊传，朱筱新教授溘然长逝，享年69岁。“《金史》地名研究”“长城研究”“浙江茶文化研究”，朱教授交给我的任务还在案头，我却再也不能见到这位屡屡对我言辞切责、殷殷期望的先生了。我一时间百感交集，愧悔之心，如春园之草。何时能完成先生的遗愿，告慰先生的英灵？这种感觉伴随了我很久。此为我内心焦虑的原因。

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困难给我的压力也不小。

我在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师培训工作，转眼已经

20余年。我比较重视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曾经以此为题目讲过不少次。听课教师们私下与我交流，也多涉及此方面内容。我2005年在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上挂过“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策略”一课，获得平台的重点推介。在文字史料、文物史料的介绍与研习中，广大教师对史料的重要价值都很肯定。在实践中，我既体会到广大一线教师工作的不易，又感到他们在教学教研需求中对历史史料中文物史料相关知识的需求尤为迫切。

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规定：“3. 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包括文献材料、图片、图表、实物、遗址、遗迹、影像、口述以及历史文学作品等，提高历史的阅读能力和观察能力，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的历史情景想象。4. 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初步学会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

这些规定传递的信息扩展了中学历史教学中使用史料的范围，许多以前不能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史料，现在都可以拿来为学生营造对历史情景的想象服务，其中就包括文物。虽然现在的历史教科书里已经有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对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文物进行了解释，但是在教师如何运用文物史料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应加大这方面的培训力度，让教师喜欢用文物教学、善于用文物教学，让历史学科教学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这是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培训者的职业责任，我必须尽力完成！

当然，对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来说，有创作热情不等于能创作出好书。要想很好地实现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我需要在内容与结构上好好下一些功夫，竭尽全力。

我的家人在生活中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是我勇于尝试的坚实后盾。北京教育学院的领导和华文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机会，衷心地感谢大家！

程 张

2017年6月

# 目录 | Contents

## 上编 文物教学运用

### 003 第一章 文物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003 一、文物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009 二、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现状

012 三、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 015 第二章 将文物应用于教学前的准备

015 一、准备成为使用文物教学的教师

018 二、了解中国文物分布、保存概况

026 三、多渠道获得文物资源

### 029 第三章 将文物应用于教学的尝试与探讨

029 一、在历史教学中应用文物的三个步骤

036 二、在教学中应用文物的四个策略

## 下编 教学文物十例

### 048 第四章 玉龙——史前文化多元一体的写照

048 一、文物介绍

054 二、教学运用

060 第五章 鹰形陶鼎——深度探寻早期文化交流

060 一、文物介绍

066 二、教学运用

072 第六章 鄂君启节——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见证

072 一、文物介绍

077 二、教学运用

082 第七章 长信宫灯——秦汉文化发展的产物

082 一、文物介绍

092 二、教学运用

102 第八章 尹湾简牍——秦汉社会发展的佐证

102 一、文物介绍

109 二、教学运用

113 第九章 击鼓说唱陶俑——汉代社会风貌的缩影

113 一、文物介绍

119 二、教学运用

127 第十章 马踏飞燕——丝绸之路上的风情

127 一、文物介绍

135 二、教学运用

143 第十一章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魏晋风度的真相

143 一、文物介绍

155 二、教学运用

164	第十二章 秘色瓷盘——唐代兴衰的见证
164	一、文物介绍
177	二、教学运用
186	第十三章 钱镠铁券——藩镇割据的产物
186	一、文物介绍
194	二、教学运用
203	附录
217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2	补记

上编 文物教学运用

一节什么样的历史课才算是好课？因为评价的角度不同，当前有很多说法。归根到底，在一节课的教学中，教师能够完成教学大纲和教案中预定的教学任务；学生在学习中，对于历史学科知识上有所得、方法上有所明、素质上有所长；这应该就是一节好课。大家习惯说：“普通的教师教知识，好的教师教方法，优秀的教师教思想。”这个说法不是说优秀的教师只讲思想内容，而不讲知识和方法。优秀的教师，应该是在讲授知识与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思想的教育，突出学科思想的影响力，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强调两点：一、深入理解和掌握历史概念和主体知识，形成清晰的、纵横交错的网状知识体系；二、用正确的史观评判事物，学生应有意识提升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在教师的指导下养成以史为据、论从史出的思维，并掌握相应的方法，同时能够借鉴历史知识，去解决个人和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就是做到以古鉴今、经世致用。

这种要求的实现，对历史教师的挑战之大可以想见。笔者以为，历史知识与历史能力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历代文物。历代文物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每个都具有时代的特点。文物都具有历史价值，不同类别的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各种类别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总的来说，文物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对文物的认知与感悟也能够转化为历史知识。这是从微观的角度看待历史的能力，使人可以具体而微、小中见大，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以历史的具象加深历史认识的方法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解读，帮助我们充分认知历史。

因此，历史教师在中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中，结合课标和教材，结合中学生的实际学情，有重点地推进学生对历史文物的认知能力的提高，促进课堂教学水平的提升，这一尝试很有价值，其经验值得推广。

# 第一章 文物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 一、文物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1922年，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总结前人的成果，结合当时西方史学界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这本书中有很大的篇幅涉及“史料学”，并明确提出“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大类，同时又将“非文字史料”界定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三种。同时，梁启超还在书中详细说明了“史料之收集与鉴别”的方法，为有志于史学者提供了入学门径。这本书在近代史学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分析了“非文字史料”的概念和内容，时间虽然晚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在内容上却更加体系化。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史学界对文物的研究是从此开始？其实也不尽然。

中国古代对文物的研究和记述也有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国古代学者对文物的研究和记述，一直并非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自成一体。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有历史研究者研究角度或研究方法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史学发展成绩卓著，但是古人对历史的学习或研究，主要是以史证史，没有文物证史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与古代文物多为官府收藏，学者难得一见有很大关系。部分官僚、士大夫虽有私人文物收藏，却秘不示人，也阻碍了文物的利用。

官府和私人收藏的文物，在社会动荡，尤其是政权更迭之际，往往会遭到毁灭性的损失，这更加重了文物资源的利用困难。历史上从商代开始，就有破坏文物的行为。商纣王被周武王讨伐，当他彻底失败时，他便把商朝历代

搜集的珍宝堆放在鹿台上，一把火将珍宝连同自己烧了个干净。秦始皇灭亡六国，将它们的所有珍宝器物都席卷一空，放在咸阳的宫殿里；收缴天下的武器，铸成十二个金人。项羽来了，秦宫被一把火烧光，珍宝也化为灰烬，据说金人后来被熔化铸成钱币。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攻占长安，一把火把长安烧成一片废墟，东汉政权只好跑到洛阳建都。北魏在洛阳建都，修建大量宫殿庙宇，后来分为东魏和西魏，在这之前把洛阳烧杀抢掠一空。北魏大臣杨衒之离乱后回到洛阳，已经认不出哪里是哪里。唐朝首都又设在长安，不到三百年的时间，被安禄山洗劫一次，被回纥洗劫一次，后来又被黄巢火烧一次。长安地区元气大伤，从此各代政权都不在此定都。

这些破坏还仅仅是记载下来的，没有记载下来的，那有多少！

比如自西汉开始，历代都采用熔器造币的方法，以补钱币流通的不足。五代柴荣（周世宗）曾下诏要求全国境内“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他要求“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明崇祯帝将内府库藏历代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熔铸钱币，以充军饷。清代以节俭著称的道光帝，还把内廷保存（含皇室历代旧藏）的各种铜器毁去铸钱。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强迫百姓“献铜献铁”，规模极大，而且毫无底线，民间铜器被搜刮一空、毁于一旦。甚至在文化昌明的当代，也发生过毁坏铜器的事。到如今，历史上原本数量众多的青铜器物已经极少了。文物资源的破坏，自然导致学者可研究和利用的资料比较少。

其次，我国古代的文物学研究自成一体，与历史研究若即若离，虽然成果蔚为大观，但是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真正称得上“养在深闺人未识”。

文物的研究在中国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只不过当时文物是作为“古董”而被研究的。古董，相比文物，内涵要小得多，甚至先前还多集中在金银珠宝、玉器青铜等狭窄门类中。例如，古人盗掘的墓葬，或是因为自然灾害发生土石崩塌、现出墓穴的墓葬里，瓦器、纸册、竹简基本上无人问津，它们被弃之不取、散落遍地的记载屡见不鲜。晋代有个叫“不准”的人，盗发战国时期的魏王墓，竟将今人视为比金银玉器还要珍贵许多的“竹书”当作火把来燃烧照明，以便去寻找金银珠玉。这件事堪为典型的例

子之一，让后人扼腕叹息。

对古董的研究后来又比较集中在青铜器和玉器研究上，人们开始从工艺美术和古文字研究的角度看待文物。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物的史料价值有了一些关注。这种风气最早出现于宋代，如宋代金石之学的兴起，欧阳修、宋徽宗、赵明诚、李清照等与有力焉，宋徽宗还召集学者出版了《宣和博古图录》等一批专业书籍。

《宣和博古图录》由北宋时期学者王黼受命于宋徽宗而搜集编纂，收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近900件。该书按器形与用途，将青铜器分为鼎、尊、壘、彝、舟、卣、瓶、壶、爵、觶、敦、簋、簠、鬲、鍑及盘、匱、钟、磬、鐃于、杂器、镜鉴等，定名非常精确，后世学者也一直使用这些称呼。王黼还很有前瞻性地各种器物按时代先后编排，共分成20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体系类似今天完备的考古学、文物学的学科体系。《宣和博古图录》一书图文并茂，对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片及对文字的释读；并有对器名、铭文所做的详尽解释和很专业的历史考证。同时书中还不厌其烦地记有器物尺寸、重量或容量，有些甚至还附记出土地点、器物的基本颜色和发现者或是收藏者的姓名。林林总总，非常翔实。

《宣和博古图录》中这些考证内容，是当时众多优秀学者研究出来的。尽管其研究方法今天已经不能一一详知，但是想来必然存在一种方法，是拿实物与历史记载的知识相对比、相参照。这种做法不正属于今日文物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吗？后代如果能够继承、延续这种研究传统，我们古代的考古学，可能就会像史学研究一样光芒万丈。

元代与明代在这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清代统治者大力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逼迫很多学者钻进故纸堆搞研究，一时间，学术界复古主义严重。众多学者在古书辨伪考证中下足了气力，文字学成果斐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吸引了很多学者研究古代器物上的文字，促进了古代文物研究的发展。同时，康雍乾三世承平日久，尤其是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古代器物，上行下效，统治者喜好古董文玩，社会上古玩消费市场火爆。二者双管



图1-1 清代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齐下，也大大促进了古器物学的研究进展。乾隆时期的《西清古鉴》洋洋洒洒40卷，还有附录《钱录》16卷。全书42册，形制仿照《宣和博古图录》而作，图文并茂。其内容涵盖清代皇室收藏的商、周、汉、唐、宋、明以来青铜器1529件之多，成为当时的集大成者。后来又有《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和《宁寿鉴古》等类型的大书问世，影响不小。一时间，清中期的古代器物学研究很是热闹，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文物鉴定的当铺“朝奉”（即相当于今日文物拍卖会上的鉴定师兼估价员），也开启了中国古文字学——甲骨文字学的大门。

清朝后期王懿荣、刘鹗等研究甲骨文，其来有自，不再赘述。他们虽然在事实上开始“考古”，但是对“文物”的概念尚缺乏细查深思。1903年，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对一千多片龟甲牛骨上的刻画符号进行了释读和考订，此书一出，在历史研究领域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不经意间，中国又开始出现北宋时期“精研器物之理”的学术风气。

再次,在清代文物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发现了文物对古代典籍的印证价值。在清代中后期,在文物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与近现代史学研究观念类似的观点。清代浙江学者章学诚的观点堪为代表。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撰写了《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史籍考》等论著几十部,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齐名,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甚至说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观点。要知道,他所论述的很多可以作为史学参考的内容,是被当时的学者视为“荒诞不经”“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实际上把很多过去学科壁垒下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甚至有把一切学科都纳入历史学科考量的格局。

到了中国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考古研究。这里首推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

西方在政治、经济上侵略中国后,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跟着传入中国。而清末又有部分文物出土,其中不乏重器,如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也促使当时的历史研究者开始借鉴西方的考古学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

王国维学贯中西,提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物的史料价值。所谓“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论述,则更加接近西方考古学思想。

事实上,从那时起,中国学者中研究历史者,其态度已然分化成两股态势,各成体系:一派仍祖述前代,在历史研究中以文献的梳理为主,兼及考古及文物诸学科新发现,并不参与考古发掘整理之过程;另一派则重立门户,以西式的学科划分和研究方法为途径,力求在考古发掘上有所突破,兼及历

史研究中诸种学术的新成果，其发现往往能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两者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两派虽术业有专攻，却能互相借鉴、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有着许多重大的进展，其中考古学与文物学的突飞猛进贡献很大。诸如河南殷墟考古发掘、河北满城汉墓发掘、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等重大考古发现，都具有填补历史研究空白、校正历史记载错误的重大价值。

但是，王国维提出这种方法距今也不过百年。其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对照，应用历史还是略显短暂，影响传播还有待时日。很多文物的史料价值还有一定争议，利用起来不是很顺畅。再加上史学典籍浩繁，很多学者以一生精力专攻史学典籍一个门类都尚且不能穷尽其中奥秘，也就很难有精力再兼顾其他，这些因素造成很长时间内一些学者在一定范围内对文物研究有所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历史学界普遍开始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对于文物的研究和对研究成果的运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提高了很多。文物研究与研究成果运用的结合更加紧密。近期，中国社会上更是掀起文物收藏的热潮，对文物的研究已经到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参与的程度，好不热闹。对于我们基础教育领域而言，其影响也很明显：教材中文物的插图越来越多，解释也越来越细。当然在历史学研究这个严肃的领域内，文物研究目前依靠的还是西方考古学及文物学的理论，现在看来，这些理论也不见得比王国维、李济（田野考古的先驱者）等人的理论高明或先进。但是这个方面尚需中国历史学者做更多的努力，等到有一天，学术界盼望的以文物说历史的著作成系统地大量涌现，史学研究必将迎来重大突破。

总之，纵观文物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彰显，其总体的趋势是：文物的知识，在历史研究者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物研究与利用，在历史学领域也越来越多！

## 二、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现状

文物的作用在历史研究者心中一天天地重要起来,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还是显得不太重视文物的教学运用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师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门系统的文物学知识教育,就算是教材中文物学的知识内容有所增加,他们也感到驾驭不了,无法将这种转变真正落实。

造成中学历史教师驾驭不了文物学知识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教师培养过程存在问题。目前,学科教育体系基本上将历史学科知识分为历史知识、文物知识这两块,或者说文物知识和历史知识是两个系统的知识。而在一般的师范类学校历史学科教育中,文物知识所占的比重较低。其结果就是很多本科毕业的师范生对中国历史上的文物知之不多。笔者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念大学时的情况,很多同学曾经表示将来要做历史教师的话,把教材上的历史事实搞清楚、弄熟悉就行了,至于文物,七零八碎的,不成体系,没有什么教学价值。当时持这种想法的同学还为数不少。

这种现象导致历史课堂中,无论是教材中的文物资料还是课外的文物知识,都很少有教师主动讲授。历史课堂中的文物教学运用案例也不太多,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的教师不多。

归纳起来,这表现为以下三种现象。

第一种,在教学设计上,中学历史教学重教材、文字、图表,轻文物介绍。大量历史教师的教学设计中基本上没有涉及教材中相关文物的部分。很多历史教师对于教材中、教参中的文物图片基本忽视,或者认为反正书上有介绍,学生自己看看就行了。

第二种,在教学过程中,不少历史教师不主动讲解文物方面的知识点,甚至在遇到学生感兴趣的文物知识时也不太重视。比如,讲到宋代瓷器的发展,课本上有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的瓷器图片,很少有教师讲课的时候主动讲解这些图片展示的是什么瓷器、有什么特色,以致内容本来很精彩,课却上得索然无味。

第三种，面对学生有关文物的提问和咨询，不少中学历史教师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要求，甚至无法准确辨识一些带年号的铜钱的基本年代，这反映出部分中学历史教师的文物知识素养还有待提升。这不是一两位教师身上出现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学生会纳闷：历史老师怎么会不懂文物呢？就像一些学生感慨自己的语文老师怎么能不会写古诗一样。

笔者再以自己的工作见闻为例谈一谈个人感受，这些感受可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从中也可以一窥端倪。

笔者进入中学历史教育这一行当快30年了，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文物教学至今还不是很受大家关注。但是有部分一线教师在工作中也主动探索了一些文物教学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0年前后，历史教育界重视一句话：“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这个理念引导下，许多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特别重视史料的展示。大家往往挖空心思去找一些历史资料，诸如稀见的笔记、新出的史学争鸣案例等。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教师设计用文物来证明历史事实的教学方案。我们最多也就是能看到某些教师拿一些文物做课堂教学的点缀，或者在课件的装饰上用一下。

那时我们在教学研究的时候也曾经尝试去探询为什么教师不在教学中使用文物。被问到的教师往往先是愣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说：“教材中没有这部分内容啊！”我们再问：“没有这部分内容，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一些，来加强课堂的教学效果呢？”这时候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教师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有的教师说手头没材料，不知上哪儿找；有的教师说不懂文物，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材料；有的教师说不知道怎样在课堂上使用文物；有的教师觉得时间不够，怕增加文物知识讲解后完不成整体教学任务。总之，课堂上他们不用文物。

2007年，北京市有一堂典型的运用文物进行课堂讲授的课程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名称是“北宋的社会经济”。授课教师将北宋的社会经济浓缩成农民阿牛去城里卖柴买油的一个故事，领着学生在《清明上河图》里游历。那时候还没有今天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他的课件以一张放大的《清明上河图》为背景，里面一点一点地将阿牛的路线标绘出来：①阿牛进

城；②阿牛吃早饭；③阿牛卖柴；④阿牛逛街；⑤阿牛买油；⑥阿牛回家。这个故事的讲授用时不到十分钟，效果很好。记得之后几年，只要和当时一起听过这节课的教师见面，大家总这么说：“北宋的社会经济，竟然用那么一张图就全给解决了！学生印象还挺深，简直太神奇了！”

笔者在北京之外也陆陆续续听过很多节历史课，结果和北京听课时的情形差不多，总体来看，就是很少看到有教师在教学中设计一定分量的文物讲授部分。

为什么文物走进教学的进展如此缓慢？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这种教学方式，还是别有隐情？

笔者就自己的感受略做分析，发现其原因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太强的专业性抬高了教师学习文物学知识的门槛，妨碍了文物学知识的课堂讲授与传播。当代各个学术领域内研究成果都很丰富，但是成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外行人基本上看不懂。文物研究领域也一样，成果知识体系浩大、专业性强。乍一看，各种专业术语和细致入微的物体分析令人眼花缭乱，导致擅长说故事的历史教师们难分轻重、不辨西东。历史研究者、教育者即使认识到文物知识的重要性和文物知识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价值，想掌握它、运用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师们觉得与其事倍功半，不如对它敬而远之。

有些教师也曾经做过尝试，在需要文物知识的时候大量查阅文物学方面的书刊资料，但是由于专业水平不够，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弄巧成拙。之后，提起文物教学他们就谈虎色变，不愿意再读文物专业书目，更不愿意研究、利用文物教学的方法。

其次，学者的文物研究成果很难直接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资源。文物学者致力于深耕自己的学科领域，其成果与历史学研究有一定距离，很难直接运用。对于历史学研究者来说，文物的学科体系、学科知识自成一体，术业有专攻，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自然很少会提及。我们历史教师的课堂资源主要来自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所以这些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具体情况，自然也会极大地影响历史教育者的信息收集、消化、迁移等。